# 關於葉型盤：
# 從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


| メタデータ | 言語: jpn<br>出版者:<br>公開日: 2017-10-03<br>キーワード (Ja):<br>キーワード (En):<br>作成者: 謝, 明良<br>メールアドレス:<br>所属: |
| --- | --- |
| URL | http://hdl.handle.net/2297/23765 |

# 關於葉形盤

## －從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

謝 明良（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 一、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青花葉紋盤的年代

一九八八年由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手發掘的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是臺灣難得一見經正式考古發掘的歷史時期遺址。依據報告書所引用《高雄市舊地名探索》，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內傳說即鄭成功（國姓爺）所設軍屯前鋒尾之所在地。舊城目前仍殘存數段城垣和三座城門，此次發掘的兩處探方，選擇在東門與南門之間，主要也是考慮到該區域與鄭氏軍屯前鋒尾的地理位置最為接近。

兩處探方除了出土若干鐵器、玻璃器、金屬胎琺瑯、銅錢和史前陶片之外，以總數達三千七百餘片的歷史時期陶瓷標本，構成遺址出土物的主要內容。陶瓷標本當中青花瓷片計一千四百餘件，其年代跨幅較大，既有早自十七世紀的遺物，但也包括了二十世紀初晚近時期的標本，其中有兩件器形大致完整帶有題記的青花葉紋盤。[1]

兩件盤均於口沿以鐵汁施加褐邊形成鐵口，其中一件於內壁飾一葉片及「太平年興」雙行草體題記，題記下方另繪一狀似帶框福字，但雙重方框印銘已難正確判讀（圖 1）。另一件殘缺較甚，但仍可從殘片清楚地觀察到青花葉紋旁有「太平年興、乙卯冬記」雙行題記（圖 2）。另從報告書揭載的圖版可知，類似的青花葉紋盤標本，至少還有兩件，但不知是否亦帶有題記。[2]

以葉紋兼題記做為主要的裝飾內容，是十七世紀清代初期青花瓷器常見的繪飾題材之一。如印尼 Tirtayasa 離宮遺址出土的大橋康二判定為景德鎮產的青花葉紋盤因與 1660－1682 年間肥前陶瓷共伴出土，同時考慮到該宮殿於 1682 年為荷蘭人所攻略，可知其相對年代亦約在這一時期。[3]其次，相對年代約於 1690 年代之越南 Vung Tau 海域打撈上岸的荷蘭籍頭頓號沉船（*Vung Tau Cargo*）也發現不少青花葉紋盤。後者器形與舊城聚落出土作品相近，口沿亦施加褐邊，但盤內壁除有葉紋和題記之外，另繪一折枝花葉。可分二式，一式於枝葉旁書「一葉傳芳」，並繪一單方框「秋」字印記；另一式則題曰：「一葉約秋氣，新春再芳菲」，部分該式作品另鈐一單方框「福」字印（圖 3），[4]是中國文學作品如《文錄》所載「一葉落知天下秋」的具像表現。

此外，1980 年代初中國江西省南昌市發掘的一處窖藏，也出土了幾件器形與臺南左營鳳山舊城聚落遺址標本相近，且同樣於口沿施加褐邊的青花葉紋題記盤，題記內容包括：「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皆秋」和「紅葉傳書信，寄與薄情人」。從伴出陶瓷的造型裝飾，及部分作品底足黏有墊砂等具有時代特徵的燒製技法，我同意報告者將窖藏的年代定為明末至清康熙年間的看法。[5]其次，從窖藏伴出有「康熙年製」款青花龍紋杯等作品看來，其又以康熙時期的可能性最大。結合前述 *Vung Tau Cargo* 沉船紀年資料，則舊城聚落所出「太平年興、乙卯冬記」青花葉紋盤上之乙卯干支，很有可能即清康熙乙卯年，即西元 1675 年。[6]另外，福建省東山島考古發現的一艘十七世紀沉船亦見青花葉紋盤，其題記包括「合興佳器，玉葉為記」和「玉堂佳器，一葉清光」。[7]應予一提的是，從上述葉紋盤題記可知，葉的種類及其象徵意涵不一，包括了梧桐、紅葉和所謂玉葉，有時又以「一葉」予以概括。

除了中國江西省景德鎮曾燒製有帶題記的青花葉紋盤（圖 4），[8]福建省安溪窯系的龍涓珠塔等瓷窯，亦見類似作品。後者青花紋飾題材豐富，既有與 *Vung Tau Cargo* 完全相同，於葉片旁另飾折枝花，且青花發色淺淡的作品；也有僅於葉片旁書：「太□年興」，下方另繪一方印記，青花色調濃艷的作品（圖 5），[9]就目前的資料看來，*Vung Tau Cargo* 與台灣左營鳳山舊城聚落所見青花葉紋盤，有較大可能來自福建地區的窯場，特別是福建省漳州窯系詔安縣朱厝窯址不僅見有器形相近，口沿亦施褐釉邊，內底書「太平年興」字樣且鈐單框「福」款的葉紋盤（圖 6），[10]故不排除臺灣左營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的葉紋盤極可能來自漳州窯系。不過，中國江西、福建複數瓷窯，甚至廣東水尾窯址也發現了帶「太平年興」題記的青花葉紋盤，[11]則這類流行於十七世紀中國沿海地區瓷窯的青花盤的精確產地比定，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另一方面，這類具有文學寓意、詩情畫意的流行葉

紋飾於日本九州佐賀縣的肥前陶瓷亦可見到。比如說，佐賀縣撰分遺跡或東京都舊芝離宮庭園遺跡都曾出土肥前青花葉紋盤，後者亦帶題記（圖 7）。[12]另從有田町多々良の元窯址出土的同類標本及瓷窯年代上下限，得知芝離宮遺跡葉紋盤的年代約於 1680－1700 之間。[13]

## 二、做為明代晚期流行圖紋的葉形

明代（1368－1644）後期葉紋被做為一種時尚的圖像記號大量地出現在多種質材的手工藝製品。其主要的表現方式有二：其一是以葉紋做為製品的主紋飾，此多見於陶瓷器皿，如近年於馬來西亞海域打撈上岸的萬曆號沉船（*Wan Li Shipwreck*）所見主要輸往歐洲的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瓷盤盤心即以葉紋為主紋飾（圖 8），[14]此一於盤心開光飾葉紋的構思也成為伊朗 Safavid 青花瓷模倣的對象（圖 9）。[15]相對於 *Wan Li Shipwreck* 的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前期，清代初期順治（1644－1661）年間景德鎮青花瓷盤也經常飾以葉紋，有的還配以太湖石，並於葉面題詩（圖 10）。[16]前述台灣遺址出土的康熙年間（1662－1722）青花葉紋盤即是在此一脈絡發展而來。不過，康熙年間的葉紋不僅是陶瓷製品常見的圖飾，其甚至被做為陶瓷器的銘款描繪於碗盤或瓶罐圈足的內裏（圖 11），[17]成為十七世紀康熙朝陶瓷獨具特色的花押款識。

除了以樹葉為紋飾，明代後期至清代初期的工藝品亦見不少模倣樹葉的象形器，常見的有銀製或竹木製的葉形茶量（圖 12）、[18]青瓷筆擱（圖 13）、[19]蓋盒（圖 14）[20]或施罩各種色釉乃至繪飾青花的葉形小盤（圖 15）。[21]有的做工極為講究，如日本入間市博物館藏的一件張希黃作煎茶用竹茶量係以留青陽文技法雕成（圖 16）。[22]其次，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碎器葉形盤（圖 17），[23]整體滿釉，底有細小支釘，其葉紋造型既體現了明代後期的流行風尚，所施罩的開片瓷釉即所謂「碎器」更是晚明文人用以寓意古物的風雅符號，[24]可說是一件成功的明代倣宋摹古之作。就此而言，同樣是臺灣故宮收藏的另一件青瓷葉形盤（圖 18），雖被定為南宋郊壇下官窯，[25]然從形制而言，似有較大可能屬明代製品，這從作品釉色及足部整修作工亦可得到類似的結論。無論如何，此類葉形盤器式不僅是明末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青花葉形盤（圖 19）的原型，[26]也為清代初期順治、康熙朝陶瓷所繼承（圖 20）。[27]

另外，明代晚期製墨名家所刊行的墨譜也可見到葉形墨錠，如明萬曆十六年（1588）方于魯刊刻的《方氏墨譜》即見「貝葉」、「桃葉」、「紅葉」墨錠（圖 21）；[28]曾為方于魯雇主的程君房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行的《程氏墨苑》也有「柳葉」、「桃葉」等墨錠（圖 22）。[29]結合前述葉形筆擱、茶量等器式，可以清楚得知葉形工藝製品常見於文房用具和飲茶道具，是和明代文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格式道具。最能如實地呈現十七世紀文人雅好葉形器用的記錄，莫過於李漁（1611－1679？）出版於康熙十年（1671）《閒情偶寄》之相關記事了。同書〈居室部・聯匾〉載有「蕉葉聯」，其製法是於切割成葉狀的木板上髹漆，再書聯句，而後描繪葉脈（圖 23）。[30]李漁認為，於蕉葉上直接題詩雖亦「韻事」，但如上述般以木狀蕉葉為聯，「其事更韻」，也就是說更有文人趣味、更為風流。相對於直聯，李漁認為葉形匾亦頗風雅，但需切記匾尺寸需視不同葉種而適度調整，正確的做法是：「蕉葉可大，紅葉宜小。」（圖 24）[31]

## 三、宋代的蕉葉盞和葉形飾

宋人龐元英《文昌雜錄》載文彥博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詩以送行，其中有「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鏤金花」；葛立方《虞美人・浴梅》：「璚蕤泛，蕉葉盃寬」，揚之水認為宋人詩詞中蕉葉盞之實物，應即中國江蘇省江浦南宋慶元元年（1195）張同之及其妻（慶元五年（1199）卒，祔葬於張同之墓右）墓出土的銀製蕉葉盞（圖 25），[32]我同意這個看法。可以附帶一提的是張同之是唐代詩人張籍之後，宋代詞人張孝祥之子，曾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等官職，生前與著名詩人陸遊交遊。張氏夫婦墓極為講究，既於木棺下方鋪石灰和水銀，亦伴出有建窯黑釉盞、定窯白瓷碗，相對於張同之墓伴出的石硯、墨和銅製筆架、鎮紙等文房具，妻章氏墓則多見銀製碗、鉢、盒、匙、筷、梅瓶以及長約 9 公分強的蕉葉酒盞，[33]看來所謂蕉葉盞應是和共伴出土的銀器同為一組講究的實用飲食器。

另外，曾於《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展出的「澄泥蕉葉硯」是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品（圖 26）。[34]在此之前，該硯亦曾收入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皇帝敕命編成的《西清硯譜》，當時定名為「宋澄泥蕉葉硯」（圖 27）。[35]硯面有研磨使用痕跡，硯周邊鐫刻乾隆御製詩並有「比德」鈐印，可知是乾隆皇帝賞玩之物。

除了張同之夫婦墓出土的酒器蕉葉盞和清宮傳世文

房蕉葉硯等象形器，宋代葉紋飾無疑要以南宋江西省吉州窯生產的葉紋黑釉茶盞最為著名，其中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所藏作品係加賀前田家傳來，曾收錄於弘化三年（1846）的《道具目錄帳》，屬流傳有緒的茶道具（圖28）。[36]在此我們應該留意的是茶盞飾以茶葉的這一現象。其實，早在1930年代中尾萬三已經注意到《本朝高僧傳》所見入宋禪師榮西（1142－1215）「登天臺山見青龜於石橋，拜羅漢於餅峰，供茶湯而感現異花於盞中」的記載或許和當時流行以剪紙貼於茶盞內壁偽為花身的茶百戲有關。[37]我認為，以自然枯葉沾釉燒成的吉州窯葉紋茶盞確實有可能意圖以此裝飾手法來營造茶戲的種種幻象。[38]與此同時，考慮到茶禪密切相關，所以似也不能排除1950年代蔣玄佁所提示寫經的貝葉亦可為茶盞的裝飾題材，[39]這從前引明代《方氏墨譜》刊載「貝葉」墨錠（同圖21）一事亦可得到類似的啟示。另外，就目前的資料看來，中國至遲於唐代中晚期已經出現將剪刻漏花印版黏貼於器坯，施釉後揭下印版入窯煅燒，企圖營造胎釉反差色比的葉紋飾陶瓷，[40]如出光美術館藏唐代壽州窯黑釉漏花即為一例（圖29），[41]而韓國新安元代沉船（1323）打撈上岸的景德鎮青白瓷花口碟則是以陽紋印花葉紋做為作品的主紋飾（圖30）。[42]

## 四、明末青花葉紋盤及其有關問題

如前所述，葉紋飾或葉形器是明代晚期流行的圖像和款式，也是其時景德鎮民窯燒造、販售的器式之一，另從前引 *Wan Li Wreckship* 打撈上岸的青花葉紋盤（同圖8）可知此類青花瓷曾輸往歐洲，而日本仙台城本丸跡也出土了帶四足的十七世紀葉形青花碟（圖31）。[43]

眾所周知，日文「染付」即中文的「青花」，染付一詞於日本文獻出現很早，東城坊秀長日記《迎陽記》康曆二年（1380）六月九日條已曾記載足利義滿等人赴二條良基邸第舉行「花御會」時，眾人所持花瓶當中已有「茶垸染付」即青花瓷瓶。[44]不過，日本的茶人卻又習慣將明末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年間輸往日本的景德鎮粗製青花瓷稱為「古染付」而沿用至今。由於所謂古染付可區分為薄胎和厚胎二類，其中厚胎製品往往因胎釉結合不良致使器物口沿剝釉形成蛀蟲啃咬般的剝痕，再加上這類製品常繪有簡逸的山水人物圖景，甚至見有宛如富士山形的小盤，其拙趣頗能契合日本茶道枯寂當中兼具奢華的意境，也因此日方學者一致將這類十七世紀景德鎮燒製的厚胎青花瓷視為是日本向中國訂製的茶道具，[45]即相對於薄胎、日常使用的「常器古染付」，厚胎者又被稱為「茶器古染付」，[46]景德鎮葉形盤即為茶器古染付的代表器形之一（圖32、33）。

日本有關所謂古染付，特別是關於厚胎茶器古染付的研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研究史上的論文、專著為數不少，然而自1950年代滿岡忠成[47]或前引1980年代矢部良明，[48]及至近年今井敦等人，[49]都一致認為包括葉形盤在內的厚胎青花瓷確是專為輸往日本的定製瓷。但是在我看來，這樣的看法未必正確。

如前所述，葉形盤和葉紋是宋代流行的器形和裝飾圖紋之一。不僅如此，在明代中晚期仿古、復古的風潮之下，葉形盤和葉紋不僅再度復甦成為文人雅好的款式，其甚至做為一種時尚的圖像符號普及至各個手工藝領域。就此觀察角度而言，明末景德鎮青花葉形盤或清初葉紋青花盤，都是在此一脈絡下所衍生的流行消費品。除了葉形盤之外，葉形茶量、筆擲、蓋盒似乎也受到以文人為主的消費階層的喜愛，部分作品東傳日本後被轉換成茶道具，如安政二年（1855）由茶具商人彙整愛好者意見模倣相撲番付格式於名古屋刊行的《形物香合相撲番付》所見「青磁一葉」（圖34），應即根津美術館藏明晚期龍泉窯青瓷葉形盒一類的作品（圖35）；[50]滴翠美術館亦收藏有帶捉手的明末景德鎮青花葉形盒（圖36），[51]看來日本唐津窯所謂「唐津一葉」（圖37）[52]之祖型也應可溯源明代的葉形盒。另從前引青花葉紋盤之「一葉傳芳」、「一葉清光」等題記得知，日本之「一葉」稱謂也應來自中國，李白《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詩》亦見「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另外，隨著煎茶的興起，葉形茶量亦備受珍重，如明治二十六年（1892）刊奧三郎兵衛《墨緣奇賞》揭載有「黃楊木茶量 秋葉式」（圖38）；[53]前引張希黃竹刻茶量則又被收入於昭和十二年（1937）《七石翁遺愛品展觀圖錄》，[54]是明治、大正時期日本煎茶家愛用的茶具。

尤應注意的是，與所謂古染付的葉形盤或葉形盒類似造型的作品，同時又見於主要輸往歐洲市場之福建建窯所燒造的「中國白」（Blanc de Chine）（圖39）。[55]因此，被汲取滿入日本茶道世界的十七世紀景德鎮青花葉形盤，其實是明代晚期流行的器式。歸根究底，其原型至少可上溯宋代的蕉葉盤。

## 五、關於「古染付」器式來源的省思

雖然，日方學者一般是將主要燒造於天啟、崇禎年間的景德鎮青花瓷區分為日常生活用青花瓷（常器古染付）以及作為茶道具的青花瓷（茶器古染付），但於茶道界則往往將「古染付」直接定義為日本茶人向景德鎮訂燒的青花茶器，亦即不認為其應包括一般生活用器在內。無論何者，由於所謂茶器古染付幾乎是僅出土、傳世於日本的器類，基本不見於中國住居遺址、墓葬或東南亞、歐洲等地消費市場，或許由於這個原故，總之截至目前的相關研究可說是由日方學者所一手包辦，形成中國陶瓷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塊奇妙版圖。鑑於以往有關茶器古染付器式來源的考察有其循序漸進而致停滯的歷程，所以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有必要針對相關研究略做回顧。

在日本茶道史上，繼承古田織部衣鉢且擔任將軍家茶師的小堀遠州（1579－1647）曾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山科道安《槐記》享保十四年（1729）二月二十六日條所載予樂院（近衛家熙，1667－1734）赴京都大德寺能光院之茶會席上置有小堀遠州向中國訂製的青花瓷一事，則是理解所謂「遠州品味」的著名記事。早在1950年代藤岡了一等人已提列該一記載，同時例舉八方形蓋罐（水指）或折扇式、紅葉式甚至摹模富士山造型的小碟（圖40），以及繪飾有和服人物立於日式乘車旁的六方缽等作品（圖41），認為其均是日本茶人委由中國陶工製作的訂燒品。[56]齋藤菊太郎基本同意上述日本茶人訂製的說法，同時參酌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所記載以木製樣盤供景德鎮陶工倣製之例，推測日本茶人或許亦曾透過木樣委由中國陶工製造符合其品味的器式。[57]此一說法雖僅止於臆測而難以實證，但卻為1970年代河原正彥等人所繼承發揚。[58]不僅如此，齋藤氏還具體提示了古染付所見和風紋樣、和式器形以及於中國器形上進行和風繪飾等案例，並且首度將古染付的圖繪與天啟六年（1621）刊行的《八種畫譜》相提並論。就所謂日本茶人的訂製品造型而言，齋藤氏認為相對於中國式的圓形碟盤，日本茶人則酷愛各種非圓器的變形碟皿，其中甚至可以見到模倣日本織部或志野燒的器形。[59]

繼1970年代河原正彥《古染付》總結鋪陳以往諸說，集大成式地蒐集羅列相關圖版提供學者極為便利的參考資料，1980年代矢部良明則具體列舉廣義古染付所見蘆雁、象（圖42）、馬（圖43）和葡萄栗鼠等圖紋並將之和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蔡汝佐《圖繪宗彝》所見同樣母題繪本進行比較，指出兩者之間的近似性，進而主張古染付的人物、花卉等也是取自明代晚期繪畫的相同母題。[60]繼此一觀察脈絡，矢部氏於1991年進一步主張見於茶器古染付的馬、兔等動物形碟，很可能是參考了其時刊刻的《圖繪宗彝》、《八種畫譜》所見類似形姿動物而複製而成的。[61]我認為矢部氏的上述未能獲得日本學界青睞的指摘雖然未必正確卻極為有趣，若結合前述1950年代齋藤菊太郎對於古染付器式來源的考察，可以認為日方學者似是傾向古染付之器式來源既有倣自日本瓷窯作品者，同時又有部份是參考了明末繪本予以轉換而成的。不過，相對於上述1950年代以來循序漸進的研究軌跡，矢部氏之後迄今的十多年間日本學界雖亦見若干有關古染付的論述，[62]可惜其內容基本上不出前述滿岡、齋藤或矢部等人的考述範圍而乏可觀的見解，所以似可將這一時期定位為日本古染付研究的停滯期。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日本島根縣富田川遺址以及和歌山根來寺遺址曾出土帶日本「天文年造」（1532－1555）款識的青花瓷小碟（圖44），[63]從近年景德鎮觀音閣窯址出土的相同年款標本，[64]可知這類標本確實是日本向景德鎮訂燒的製品。結合前述齋藤氏所指出茶器古染付中可見織部燒之帶提手長方盤以及繪飾有俗稱御所車之日式坐車兼和服人物等器形和紋飾，可以認為所謂茶器古染付當中確實包括一部分日本訂燒製品在內。問題是，茶器古染付當中經常可見的各式動植物形碟皿，恐怕並非是如矢部氏所推測之來自明末的繪本，而有更大可能是來自明代的墨譜，後者可說是集中體現了明代晚期流行的圖像記號。

從以上葉形盤的考察可知，葉形盤並非如日方學者所推測是來自日本茶人的訂製，而是明代晚期復古風潮下的流行器式，《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所見葉形墨錠也說明了文人對於葉形器式的喜愛。值得留意的是，《方氏墨譜》等所收諸多象形墨錠之造型卻又和日本學界針對古染付之所謂「形物」，即由茶人所訂製的茶具規格品頗有雷同之處。

除了前述「桃葉」、「柳葉」、「貝葉」等之外，如《方氏墨譜》或《程氏墨苑》所見「螺黛」、「竹胎」等之造型就和貝形（圖45）、筍形（圖46）古染付皿一致。其次，《方氏墨譜》的「玄象」、「狻猊」、「玉魚佩」、「雙魚」、

「玉貂蟬」之造型也相當於古染付「形物」中的象（圖47）、唐獅子（圖48）、魚形皿（圖49、50）和蟬形皿（圖51）。其次，《程氏墨苑》的「玄壺」既和古染付「瓢形鉢」（圖52）有類似之處，由兩件圓璧疊合而成的「合璧」也有可能即古染付「雙菊花形」皿的原型（圖53）。[65]另外，就如河原正彥所指出般，載錄於前引安政二年（1853）《形物香合相撲》西方的「前頭 染付水牛」（同圖34），應即於盒蓋繪牛臥於波浪上的所謂「水牛香合」（圖54）。[66]問題是，這類備受日本茶道界珍重的形物盖盒，盒蓋所見青花繪牛呈回首仰望造型，牛上方另飾弦月，可知其表現的正是傳為周代《關尹子》所載「譬如犀望月，月形入角」有感而生影的「犀牛望月」之中國傳統著名圖紋，宋代陶瓷之外，明代中期景德鎮窯器亦見不少此一母題的青花瓷（圖55）。[67]因此，所謂茶器古染付不僅包括明末文人喜愛的造型，也包括部分的中國傳統圖繪。另外，令人興趣盎然的是十七世紀後半日本著名陶工仁清作結文鉢（圖56），[68]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古染付結文鉢（圖57）或結文盖鉢之原型，然而其是否可能又和《墨譜》所載「浮玉」（圖58）有關，即參考中國古代「玉珩」進一步和樣化而成？由於仁清作品當中亦見與《程氏墨苑》「螺黛」（同圖45左）形似的螺形香爐（圖59），所以此一議題或許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雖然，有關日本茶人訂製、挑選景德鎮青花瓷的過程細節目前仍一無所知，而若依據大庭修的研究，《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分別於享保二年（1717）、享保十二年（1727）已曾輸入日本，[69]就此而言，與墨譜器式相近的日本傳世大量古染付或可做為方、程二氏墨譜可能早在十七世紀已經被攜來日本並成為茶人流行讀物的證據之一，可補文獻記載的不足。

基於所謂古染付之器式和墨譜所載錄之各式墨錠造型的近似性，我認為日本學者將明末景德鎮所燒造之厚胎、釉帶乳濁且胎釉結合不良致口沿有剝釉現象的古染付形物一律視為是日本茶人訂製的說法不僅過於武斷，也忽視了晚明消費文化和景德鎮燒瓷的互動和影響。雖然，從中國原有器式當中進行選擇、採購這一舉措是否可納入廣義的「訂製」或許可因人而異？無論如何，設若日本茶人曾經在中國既存的器式當中進行挑選，此時，前引墨譜無疑可提供其便捷的參考圖式。另一方面，從現有古染付作品中包括不少未見於墨譜的器式，可知此一時期景德鎮青花瓷器形的來源頗為多元，絕非墨譜所見墨錠形式所能囊括。因此，所謂古染付的器式來源基本有二，其一是借鑒自明代流行的圖像，墨譜僅為當中顯著的案例。其二是日本的訂製，此又可區分成日本國圖像的發注（如富士山形碟），以及日本人自明代流行圖像進行選擇採購。此時，包括墨譜在內的版畫圖籍應是其重要的參考指南，雖然此一「訂製」並非日本的創意，但摒棄一般習見的中國圈足盤而代之以柱形三足或四足之盤式已然是日本趣味的展現。同時，雀屏中選的器式被大量地製作並輸往日本成為茶會、懷石膳的道具。其中，原型可上溯宋代的葉形盤既為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美濃或高取等瓷窯所倣效（圖60），[70]甚至成了十九世紀京都著名陶工永樂保全模倣的對象（圖61），[71]但作品所呈現的氣氛已是十足的「和樣」了。

## 註

1 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3分（1993），頁763-865。

2 臧振華等，前引〈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圖版25、26、40。

3 大橋康二、坂井隆，〈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址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1999），圖版4之5；大橋康二，〈秋二題〉，《目の眼》1999年12期，頁51。

4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1992), nos. 883-886.

5 余家棟，〈江西南昌發現一批窖藏瓷器〉，《文物》1984年8期，圖版5之7。

6 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原載《台灣史研究》3卷1期（1996），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頁220。

7 陳立群，〈東山島冬古沉船遺址初探〉，《福建文博》2001年1期，頁36圖3。

8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5期，頁32圖116。

9 葉清琳，〈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Ho Chui mei edit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頁83圖版1之8；筆者攝。

10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圖版16之5。

11 楊少祥，〈廣東青花初探〉，Ho Chui mei edited, op. cit, 頁4圖版1之8。

12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國內出土の肥前陶磁》（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84），

頁 80 圖 858 頁 121 圖 243。前者撰分遺址標本屬 1700－1780 年代作品；後者舊芝離宮庭園遺址標本被定年於 1700－1760 年代之間。

[13] 大橋康二，〈肥前陶磁の交流諸問題〉，《東洋陶磁》25（1996），頁 33；及前引〈秋二題〉，頁 50。

[14]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 228, no. 4622; p. 234, no. 7475; p. 236, no. 7104.

[15] Yolande crow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1-1738*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2), p. 39, pl. 400.

[16] Sir Micheal Butler, Margaert Medley, Stephen Littl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Butler Family Collection*, Ar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lexandria, Virginia, p. 163, pl. 109.

[17] Sir Micheal Butler, op. cit. p.181, pl. 125.

[18]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靜嘉堂藏 煎茶具名品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8），頁 75 圖 112。

[19]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名品選》（兵庫縣：黑川古文化研究所，1990），頁 84 圖 77。

[20] Christie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Including Export Art,* (no. 7415), London 2007, p. 99, no. 102.

[21]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顏色釉》（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頁 214 圖 193。

[22] 入間市博物館，《「煎茶」傳來－賣茶翁と文人茶の時代－》（琦玉縣：入間市博物館，2001），圖 96。

[23] 李玉珉主編，《古色 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 36 圖 I-06。

[24] 謝明良，〈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原載《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收入前引《貿易陶瓷與文化史》，頁 361-381。

[2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宋官窯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 102 圖 66。

[26]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陶磁篇Ⅱ》（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 98 圖 381。

[27] Christie's, op. cit., p. 254, no. 242.

[28] （明）方于魯（吳有祥整理），《方氏墨譜》（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154、179、207。

[29] （明）程大約，《程氏墨苑》，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315、635。另外，關於《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的討論可參見：蔡玫芬，〈明代的墨與墨書〉，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第二冊，頁 682-725，以及林麗江有關墨譜墨錠圖形的考察，參見：LIN Li-chiang, *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yuan（圖像的增生與擴散《程氏墨苑》與《方氏墨譜》的墨樣與編印）,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8, pp. 154-200.

[30] （清）李漁，《閒情偶記》（台北：明文書局版，2002），頁 166 圖 10「蕉葉聯」。

[31] （清）李漁，前引《閒情偶記》，頁 172 圖 17「秋葉匾」。

另外有關葉紋與文人趣味的簡短討論已見劉朝暉，〈瓷畫、版畫與文人趣味〉，《中國古陶瓷研究》5（1999），頁 52-53；王淑津，〈青花葉紋盤〉，收入《國立台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2007），頁 75-77。

[32] 揚之水，〈宋詩中的幾件酒具〉，《文物天地》2002 年 7 期，頁 60。

[33]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 年 4 期，頁 66 圖 12。

[3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 131 圖Ⅱ-17。

[35] 《欽定西清硯譜》卷四，收入《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版）843 冊，頁 229。

[36] 西田宏子等，《天目》中國の陶磁 6，中國陶磁大系（東京：平凡社， 1999），圖 51。

[37] 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陶磁》8 卷 3 期（1936），頁 25-26。

[38] 謝明良，〈《清異錄》中的陶瓷史料〉，收入《陶瓷手記》（台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 328。

[39] 蔣玄佁，《吉州窯》（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頁 30。

[40] 謝明良，〈宋吉州窯剪紙漏花碗雜識〉，收入前引《陶瓷手記》，頁 151-159。

[41] 出光美術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 64。

[42] 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韓國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 106 圖 95。

[43] 渡部紀，〈仙台城本丸跡出土陶磁にみる傳世〉，《貿易陶磁研究》28（2008），頁 17，圖 10 之 13。

[44] 赤井達郎等編，《資料日本美術史》（京都：松柏社，1989），頁 159；佐藤豐三，〈尾張德川家藏帳にみる唐物染付の名稱〉，《尾陽－德川美術館論集》3（2006），頁 36 等參見。

[45] 矢部良明，〈古染付と祥瑞－明末景德鎮民窯と桃山文化の出合い－〉，《古美術》70（1984），頁 111。

[46] 河原正彥，《古染付》資料編，（京都：京都書院，1977），頁 220。

[47] 滿岡忠成，〈明末の青花と五彩〉，《世界陶磁全集》11 元明篇（東京：河出書房，1955），頁 234；《茶のやきもの》（京都：淡交社，1969），頁 65-68。

[48] 矢部良明，前引〈古染付と祥瑞〉，頁 111。

[49] 今井敦，〈明末期の民窯磁器の意匠にみられる〈文人趣味〉について〉，《MUSEUM》610（2007），頁 5-6。

[50] 小田荣一，〈香合の種類〉，《香合》（東京：根津美術

館，1972），頁 111 及頁 53，圖 65。

[51] 河原正彦，前引《古染付》，頁 28，圖 102。

[52] 小田荣一，前引〈香合の種類〉，頁 120 及頁 59，圖 84。

[53]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前引《靜嘉堂藏煎茶具名品展》參考資料，頁 138Ⅱ-34。

[54] 入間市博物館，前引《煎茶傳來－賣茶翁と文人茶の時代－》，圖 96。

[55]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 106, pl. 46-c.

[56] 藤岡了一，〈古染付と吳須〉，《世界陶磁全集》7・茶器篇（東京：河出書房，1955），頁 258-265。

[57] 齋藤菊太郎，《古染付》陶器全集 15（東京：平凡社，1959），頁 19。

[58] 河原正彦，前引《古染付》，頁 231。

[59] 齋藤菊太郎，前引《古染付》頁 14-18；《古染付 祥瑞》陶磁大系 44（東京：平凡社，1972），頁 96-102。

[60] 矢部良明，前引〈古染付と祥瑞〉，頁 109。

[61] 矢部良明，〈織部と古染付の出會い〉，《織部と古染付－美濃と景德鎮の出會い－》（岡山：林原美術館，1991），無頁數。

[62] 如西田宏子等，《明末清初の民窯》中國陶磁全集 7（東京：平凡社，1997），頁 112-124。

[63] 長谷部樂爾，〈日本出土の元、明陶磁〉，《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東京美術，1978），頁 136；河原正彦，《日本人が好んだ中國陶磁》（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1），圖 121 の解說；尾野善裕，〈白磁花菱形小皿〉（「天文年造」染付銘）《日本歷史》611（1999.4）（口繪解說）。

[64] 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瓷窯考古隊，〈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瓷窯考古發掘〉，《文物天地》2008 年 7 期，頁 92（ST01③d）；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12 期，頁 50 圖 46。

[65] （明）程君房，《程氏墨苑》，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290「螺黛」、頁 315「桃葉」、頁 615「玄壺」、頁 632「合辟」、頁 635「柳葉」、頁 756「雙魚玦」；（明）方于魯《方氏墨譜》（吳有祥整理）（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125「玉魚佩」、「玉貂蟬」、頁 150「狻猊」、頁 154「桃尊」、頁 176「竹胎」、頁 190「玄象」、頁 207「貝葉」。另外，這裡所比較的日本傳世青花瓷係參見河原正彦，前引《古染付》（資料篇），頁 28 圖 102（葉形盒）、頁 195 圖 741（螺形碟）、頁 186 圖 718（竹形碟）、頁 187 圖 720（象形碟）、頁 191 圖 730（獅形碟）、頁 193 圖 738（魚形碟）、頁 194 圖 739（雙魚碟）、頁 182 圖 709（雙菊形碟）、頁 67 圖 258（瓢形碟）、頁 5 圖 9（牛圖盒）、頁 78 圖 298（結文碟），以及五島美術館學藝部《向付 茶の湯を彩る食の器》（東京：五島美術館，2009），頁 104 圖 68。

[66] 河原正彦，前引《古染付》，頁 227，及頁 5 圖 9、10。

[67]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景德鎮民間青花磁器》中國陶瓷全集 19（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社，1983），圖 48；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前引〈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頁 45 圖 14。

[68] 茶道資料館，《茶の湯と香合－國燒を中心に》（京都：茶道資料館，1974），圖 26。

[69] 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1967），頁 66-68 及頁 246-247、頁 488、頁 579、頁 662 及頁 710。

[70] 五島美術館學藝部，前引《向付 茶の湯を彩る食の器》，頁 55。

[71] 三井文庫三井記念美術館，《永樂の陶磁器－了全、保全、和全－》（東京：三井記念美術館，2006），頁 19 圖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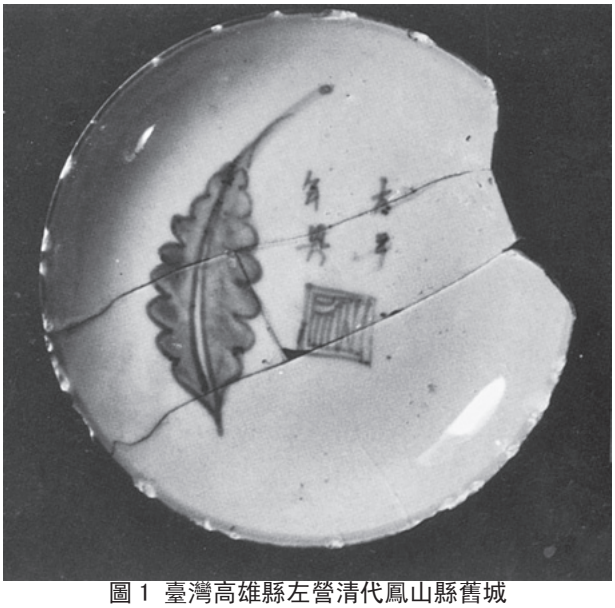

圖 1 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
聚落遺址出土青花葉紋盤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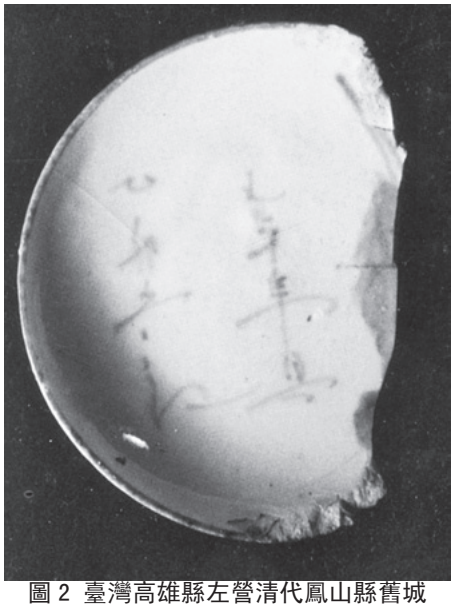

圖 2 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
聚落遺址出土青花葉紋盤

圖 3 越南 *Vung Tung Cargo* 發現的
青花葉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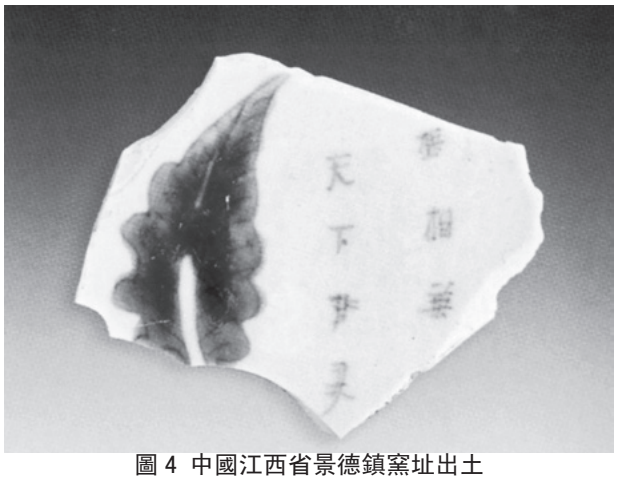

圖 4 中國江西省景德鎮窯址出土
青花葉紋盤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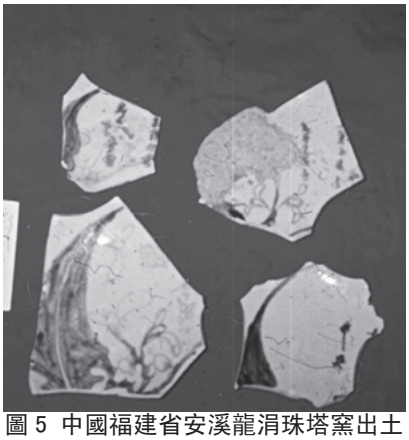

圖 5 中國福建省安溪龍涓珠塔窯出土
青花葉紋盤

圖 6 中國福建省紹安縣朱厝窯址出土
青花葉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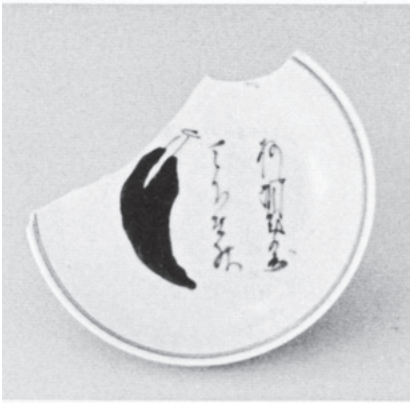

圖 7 日本國東京都舊芝離宮廷遺址出土
肥前青花葉紋

圖 8 馬來西亞 *Wan Li Shipwreck* 發現的 Kraak porcelain

圖 9 伊朗 Safavid 青花葉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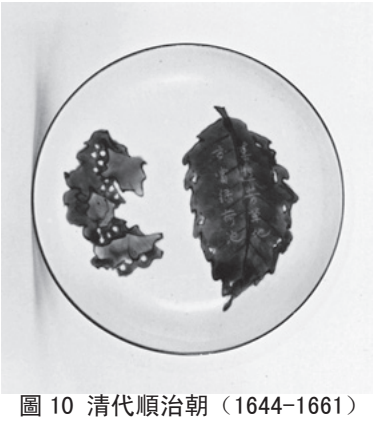

圖 10 清代順治朝（1644-1661）青花葉紋盤
The Butler Family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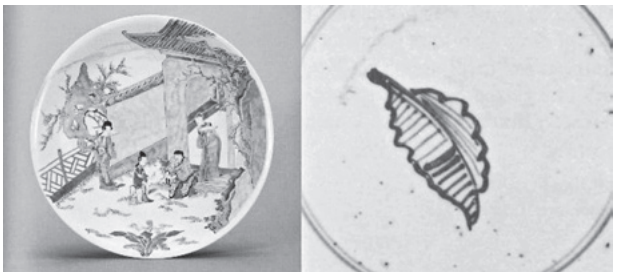

圖 11 清代康熙朝（1662-1772）瓷盤及外底所見葉形款
The Butler Family Collection

圖 12 葉形竹茶量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圖 13 龍泉窯青瓷筆擱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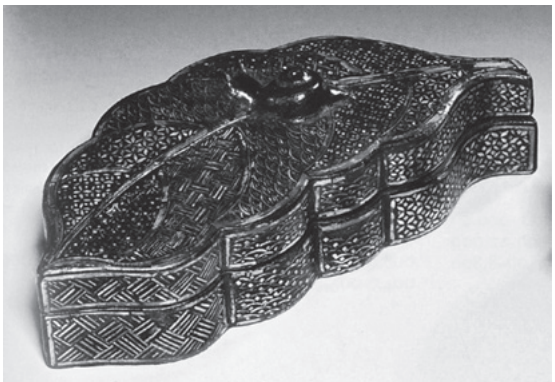

圖 14 清代康熙朝（1662-1772）
鑲螺鈿蝸文葉形盒

圖 15 明代石灣窯葉形盤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張希黃作葉形竹茶量
入間市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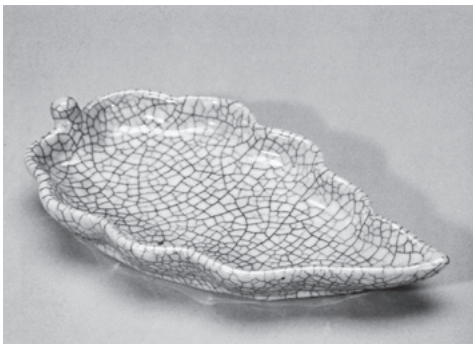

圖 17 清宮傳世碎器葉形盤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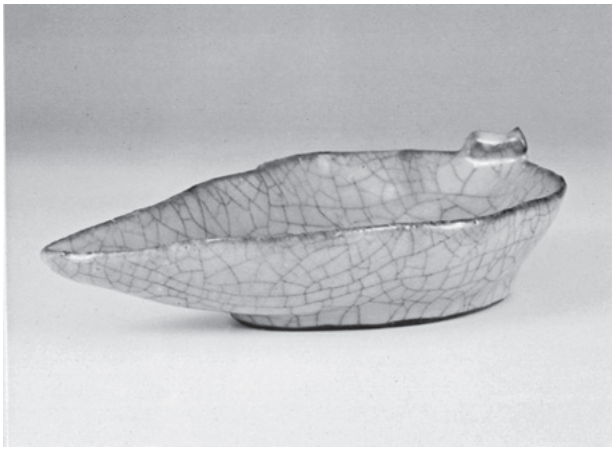

圖 18 明代青瓷葉形盤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明末青花葉形盤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20 清代康熙朝（1662-1772）五彩葉形盤

圖 21《方氏墨譜》（1588）所見
「貝葉」、「桃葉」、「紅葉」墨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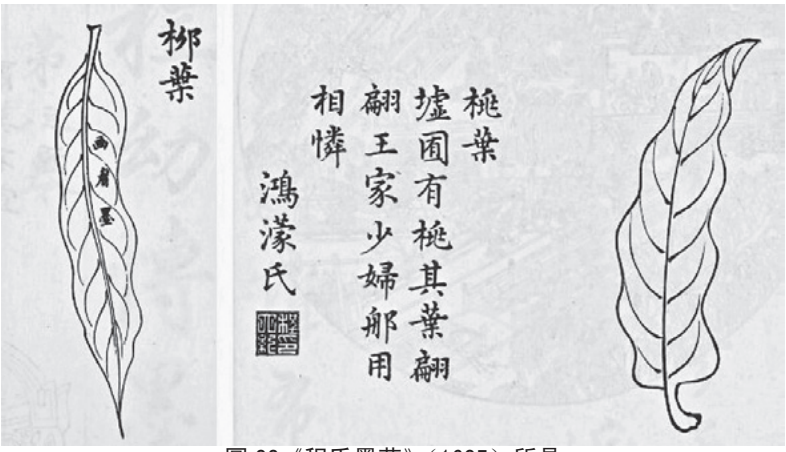


圖 22《程氏墨苑》（1605）所見
「柳葉」、「桃葉」墨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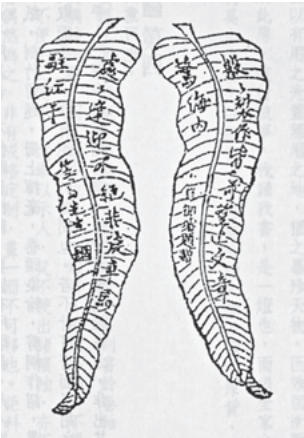

圖 23《閒情偶記》（1671）所見
「蕉葉聯」

圖 24《閒情偶記》（1671）所見
「秋葉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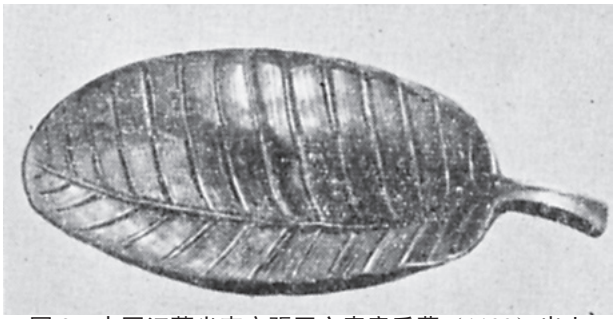

圖 25 中國江蘇省南宋張同之妻章氏墓（1199）出土
銀蕉葉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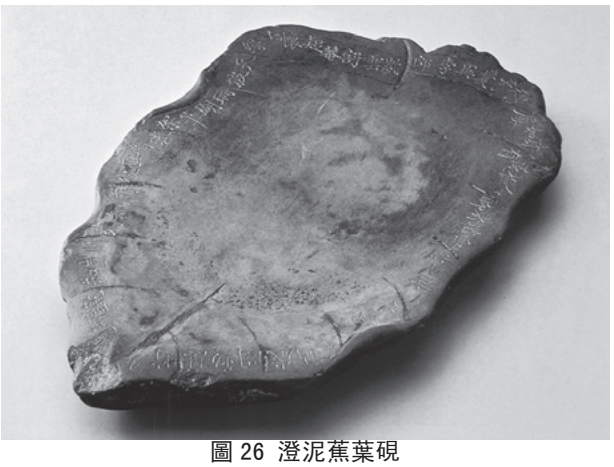

圖 26 澄泥蕉葉硯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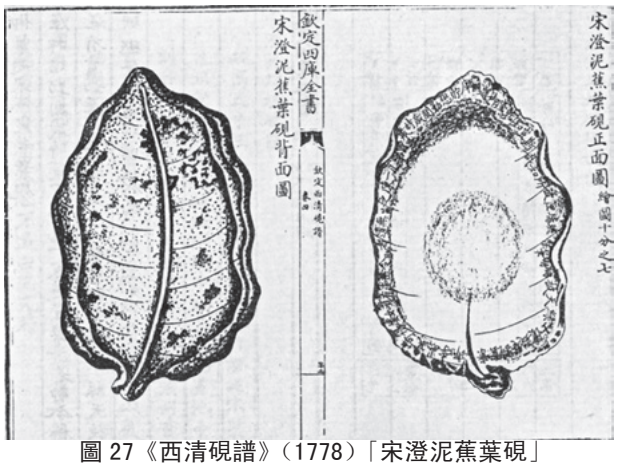


圖 27《西清硯譜》（1778）「宋澄泥蕉葉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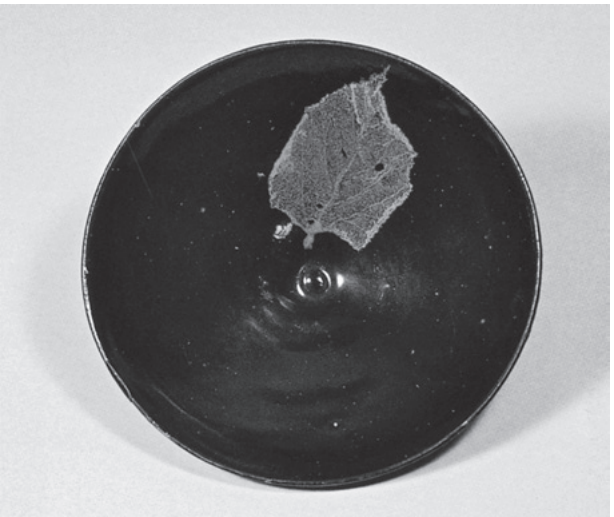

圖 28 南宋吉州窯葉紋盞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 29 唐代壽州窯黑釉漏花枕
出光美術館藏

圖 30 韓國新安船打撈上岸的
景德鎮青白瓷葉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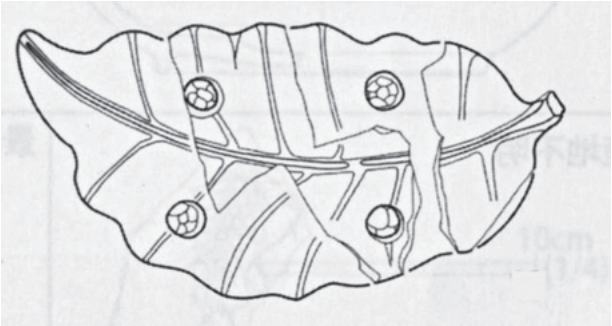

圖 31 青花葉形盤線繪圖
日本仙台城本丸跡出土

圖 32 青花葉形碟
德川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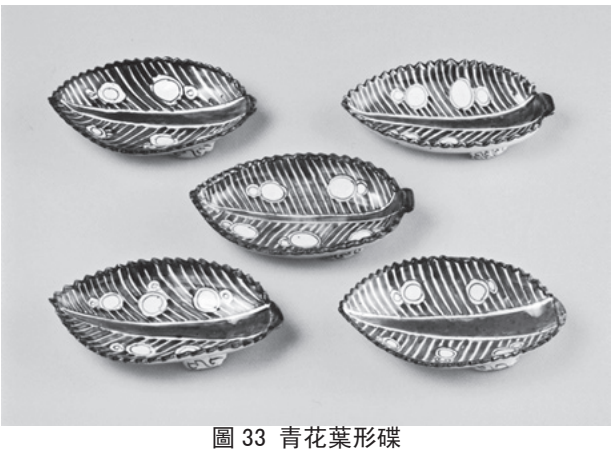

圖 33 青花葉形碟
石洞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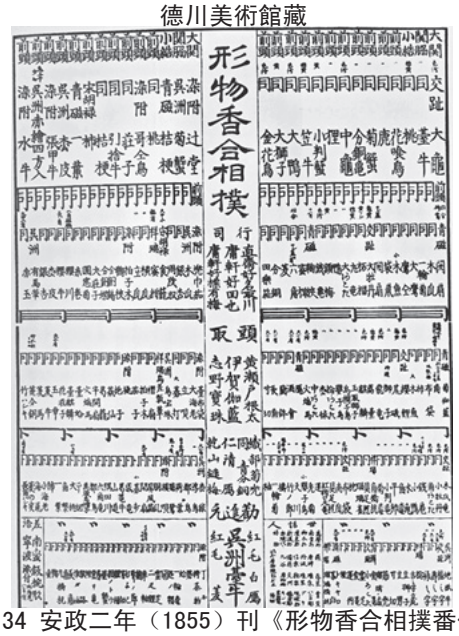


圖 34 安政二年（1855）刊《形物香合相撲番付》

圖 35 龍泉窯青瓷葉形盒
根津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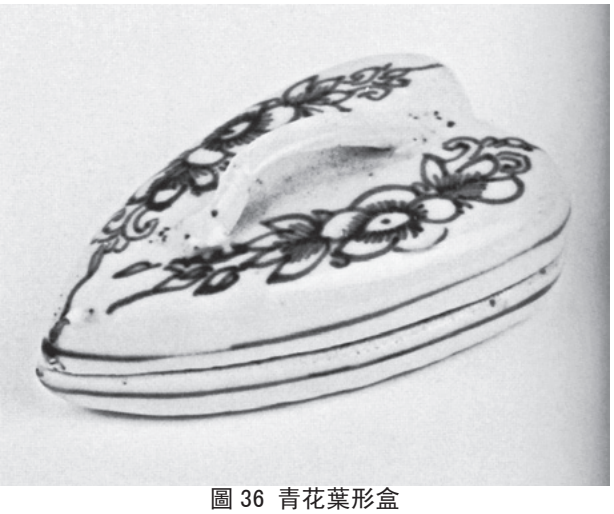

圖 36 青花葉形盒
滴翠美術館藏

圖 37 唐津燒葉形盒

圖 38 明治二十六年（1892）《墨緣奇賞》所見
秋葉式茶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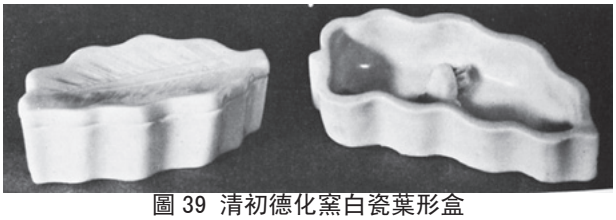

圖 39 清初德化窯白瓷葉形盒

圖 40 青花富士山形碟

圖 41 青花御所車圖六方盤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42 左 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
《圖繪宗彝》和刻本 象圖
圖 42 右 青花象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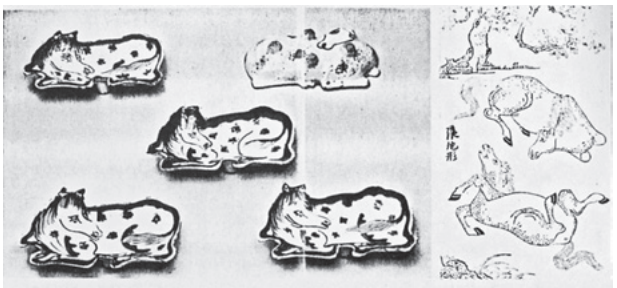

圖 43 左 青花馬形碟
圖 43 右 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
《圖繪宗彝》和刻本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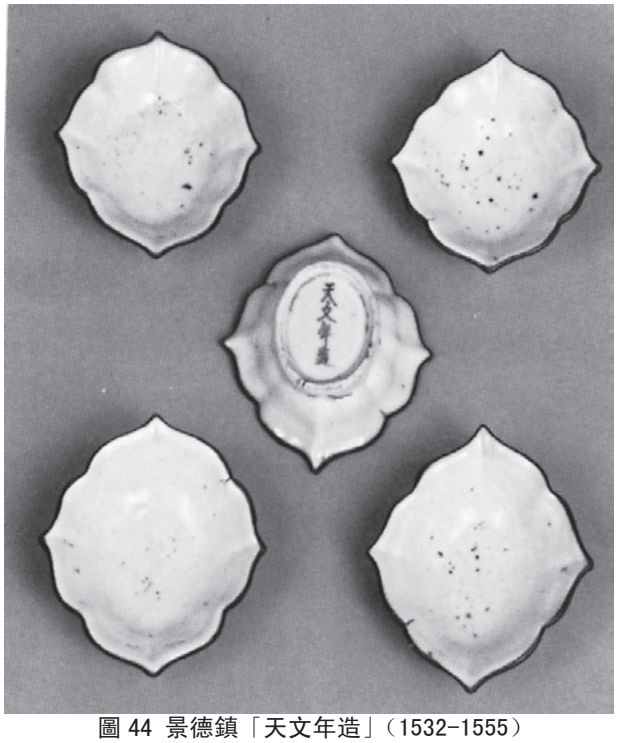

圖 44 景德鎮「天文年造」（1532-1555）
青花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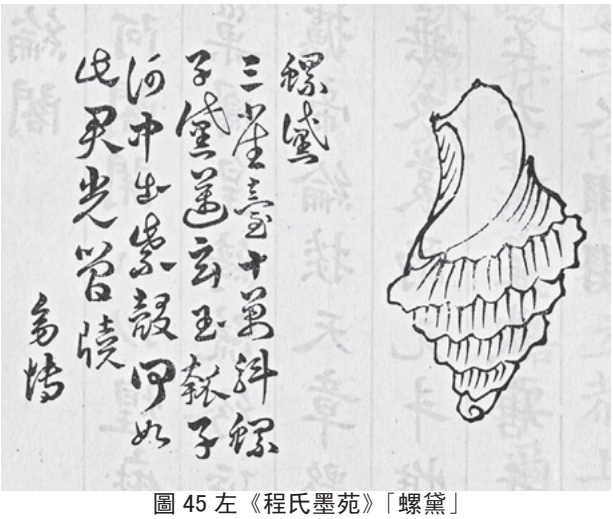

圖 45 左《程氏墨苑》「螺黛」

圖 45 右 青花螺形碟

圖 46 左《方氏墨譜》「竹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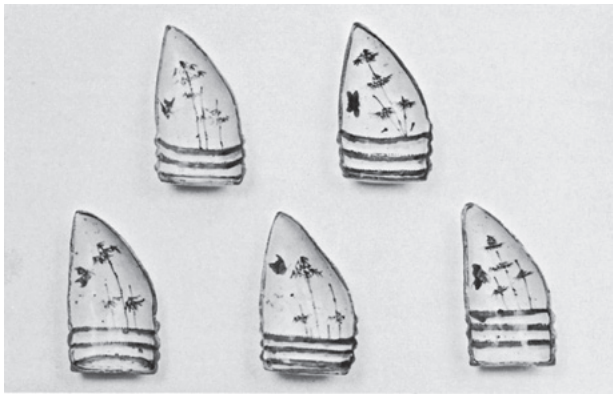

圖 46 右 青花竹形碟

圖 47 左《方氏墨譜》「玄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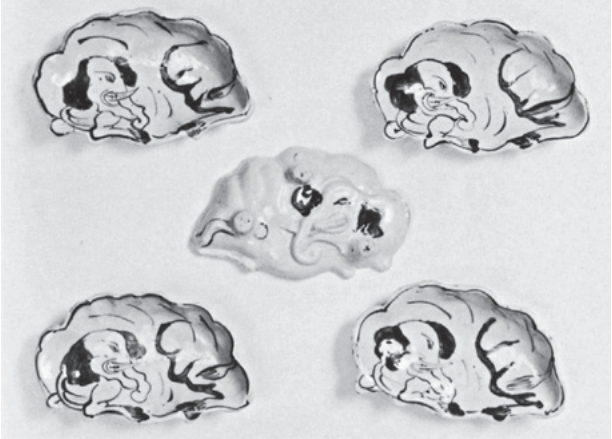

圖 47 右 象形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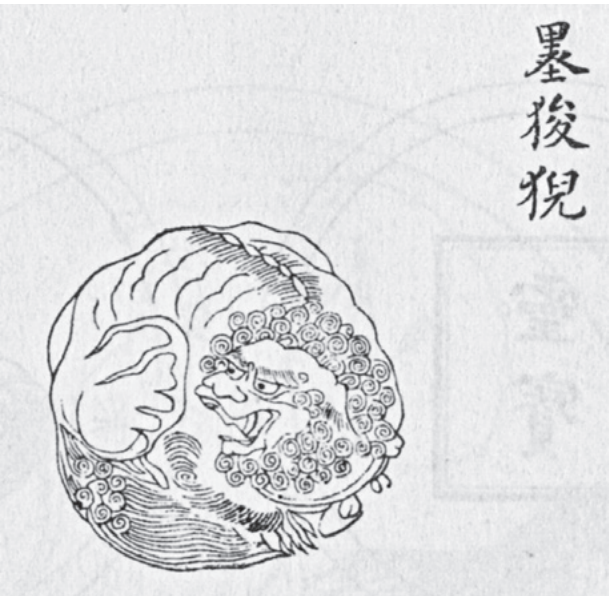


圖 48 左《方氏墨譜》「狻猊」

圖 48 右 青花獅形碟

圖 49 左《方氏墨譜》「玉魚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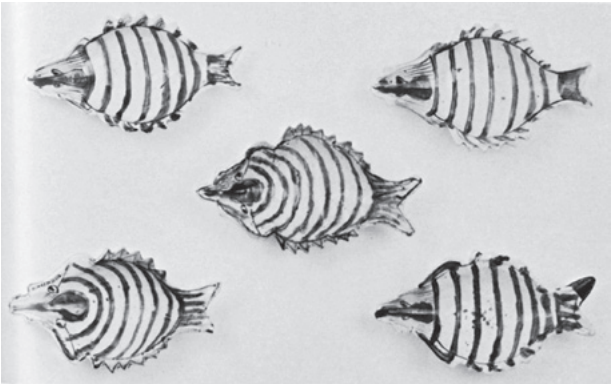

圖 49 右 青花魚形碟

圖 50 左《程氏墨苑》「雙魚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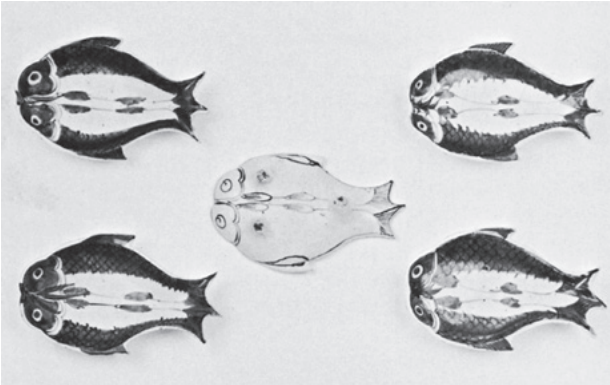

圖 50 右 青花雙魚碟

圖 51 左《方氏墨譜》「玉貂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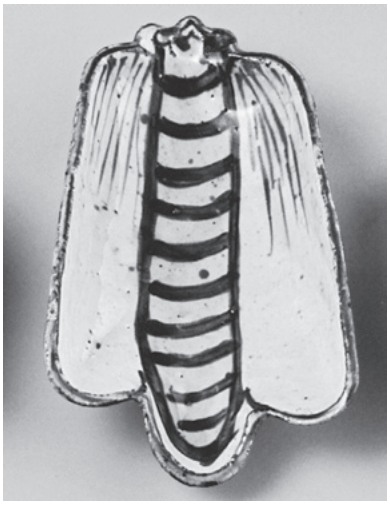

圖 51 右 蟬形青花碟
石洞美術館藏

圖 52 左《程氏墨苑》「玄壺」

圖 52 右 瓢形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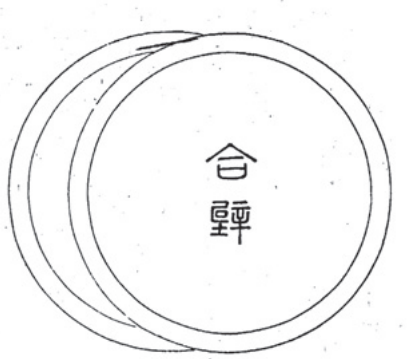


圖 53 左《程氏墨苑》「合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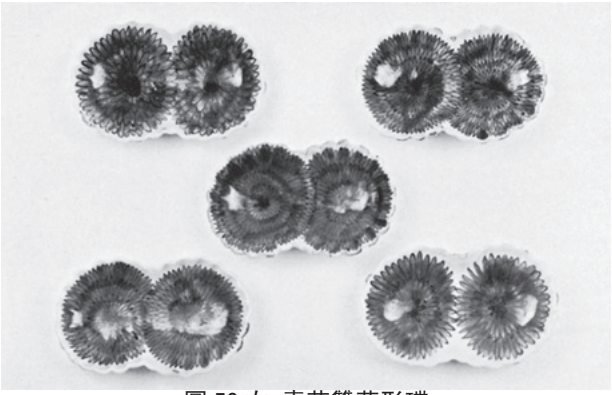

圖 53 右 青花雙菊形碟

圖 54 青花「水牛香合」

圖 55 明代中期「犀牛望月」青花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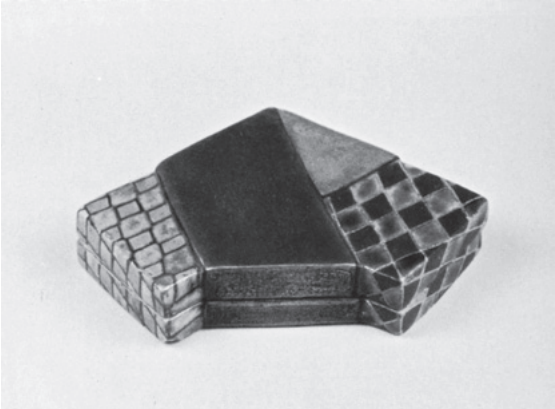

圖 56 仁清作結文蓋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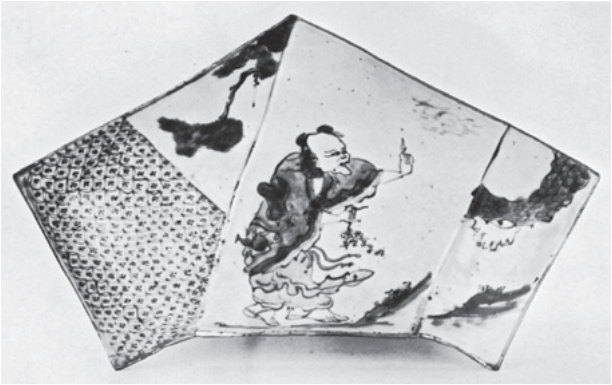

圖 57 青花結文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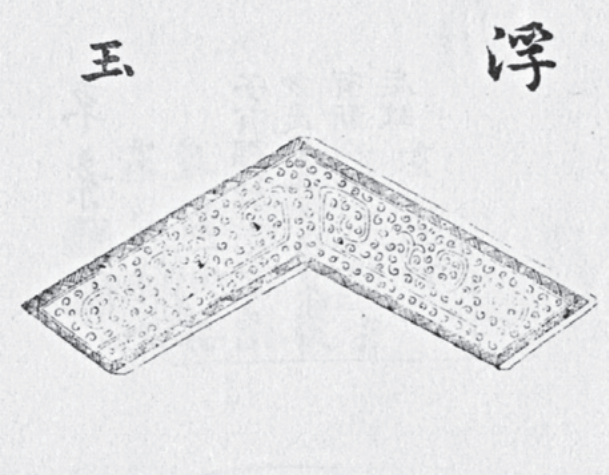


圖 58《方氏墨譜》「浮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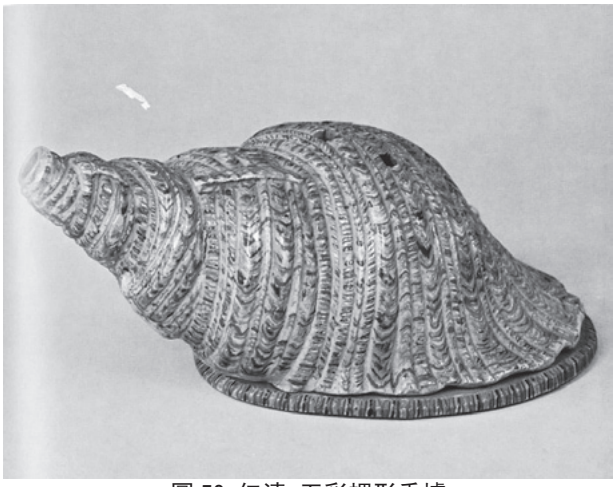

圖 59 仁清 五彩螺形香爐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圖 60 美濃御深井釉葉形碟
土岐市美濃陶磁歷史館藏

圖 61 保全作 葉形碟（1843-1847）